

# 鄂豫皖红军连战连捷破“清剿”

胡遵远



反“围剿”战斗中的红军指战员

1932年10月,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随红四方面军向西转移,七十五师继续留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斗争。11月29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决定并于次日组建了新的红二十五军,1933年1月初,又组建了红二十八军。在中共鄂豫皖省委的领导下,红二十五、红二十八军两支主力红军与根据地广大干部群众密切配合,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郭家河、九龙长岭、潘家河等战斗的胜利,打破了蒋介石苦心经营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实行的大规模划区“清剿”,为进一步开展对敌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 郭家河专打“精锐”

1933年2月初,由于国民党军各部被红军挫败,蒋介石的大规模划区“清剿”计划未能按预期实现,于是调动“嫡系”部队参与“进剿”,接替“杂牌军”的防务。对此,中共鄂豫皖省委总结两个月来的斗争经验,并根据情况的变化,决定红二十五军集中行动,以便在运动中捕捉和创造战机,寻歼孤立薄弱或突出冒进之敌。

3月4日,敌之“精锐”三十五师二〇五团、二〇七团按照蒋介石的亲自部署,进占郭家河,接替第八十九师的防务。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分析了敌我情况后认为,敌三十五师两个团孤军深入(离周围敌人驻地都有一定的路程),应该乘敌立足未稳之机,集中主力将其歼灭。

在麻城以北地区待机的红七十四师接到命令后,连夜赶到新集以南的野鸡窝,与红七十五师会合。经研究决定,由红七十四师和特务营进攻郭家河的敌人;红七十五师占领郭家河东北的横云山(又称磨儿山)一带,担任对新集之敌的打援任务,并在必要时支援对郭家河的进攻。

3月5日夜,红二十五军在野鸡窝进行政治动员。军长吴焕先分析了这次战斗的意义和取得胜利的条件,号召全军指战员英勇战斗、打好全军集中兵力作战的第一仗。随后,部队连夜向郭家河开进。6日拂晓,到达郭家河东南戴家岗一带。吴焕先命令红七十四师以红二〇二团及军特务营迂回到郭家河东北方向实施主攻,红二二二团从郭家河以南及西南实施攻击。

战斗打响后,红二二二团以勇猛迅速的攻势,将郭家河东南羊人岩(又称羊儿岩)高地的敌人警戒部队一个营大部歼灭。接着,红二二二团由西南,红二〇二团和军特务营由东北,以合围之势向郭家河之敌发起猛烈攻击。地方武装、游击队和群众呐喊助威也到达战场协助进攻敌人,让红军士气大增,经过勇猛冲杀,敌人一部就地被歼,其余仓皇向西北逃窜。红军立即追击,将其围困于二道河西南洼地,又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将残敌歼灭。少数漏网的敌人,

又被地方武装和群众全部俘获。

郭家河战斗是红二十五军重建后的首次胜利,这次战斗,红军将敌两个团全部歼灭,毙敌第二〇七团团长以下100余人,俘敌第二〇五团团长以下2000余人,缴获山炮一门、迫击炮8门、机枪12挺、长短枪2000多支、子弹10万余发,战马百余匹。

## 轮流“牵牛鼻子”

3月10日,蒋介石集中八十师二三八旅、三十师八十八旅以及三十一师的四个团,赶来“救援”。红二十五军得到情报后,迅速潜行至黄安东北的袁英河地区,包围了打鼓岭,向岭上守敌展开进攻;同时派少数部队佯攻宋埠,吸引敌人主力掉头向南。两天后,敌人才判明红二十五军主力的位置,连忙命令被“牵着鼻子走”的各部队速返回袁英河地区,同时命令驻黄安的敌十三师向袁英河进攻。红二十五军认为:敌十三师孤军深入,而其他各路敌人一时还难以赶到,于是决定抓住这一个良机,果断发起进攻。13日拂晓,红二十五军在袁英河以南的九龙长岭向敌十三师发起猛攻,激战一个半小时,在给予敌先头部队七十七团以毁灭性打击后,向麻城北部的杨泗寨地区迅速转移。

敌人匆匆赶到,却发现红军已经东去,只得以后第三十、第三十一师的六个团为左翼纵队,第十三师的两个团为中央纵队,第八十九师的四个团为右翼纵队,对红军发起三路追击,企图于19日将红军“会剿”于杨泗寨。红二十五军一面大踏步转移,一面在沿途利用有利地形,发起伏击,消灭追敌700余人。

这时,红二十八军也来到了麻城福田河地区,面对跑得早已疲惫不堪的敌人各路追兵,红二十五军秘密北上至光山南部地区休整,切断其退路,然后红二十五军,“大张旗鼓”东返至皖西北地区,“牵着敌人的牛鼻子继续赶路”。

敌人跟着红二十八军一路狂奔,迫至商南地区南溪以西的九歌山、关王庙一带时,已经累得筋疲力尽,纵兵搜索,又不见了红军踪影,气得破口大骂情报部门无能,最后垂头丧气地返回原防地。而红二十五军则乘此时机,在

光山南部的南向店地区进行休整,为下一步的反“清剿”斗争做好了准备。

## 潘家河大捷

4月初,红二十五军再次来到麻城北部的麻城地区。这时,红二十八军也由皖西北到达该地(二四四团一营和军部特务营留在皖西北)。两军会合后,为进一步集中兵力打破敌人的“清剿”,中共鄂豫皖省委于4月8日决定,将红二十八军编为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

为了收复黄安以北地区,红二十五军西进至郭家河,准备歼灭罗山卡房之敌。此时,两个月来疲于奔命、一无所获的敌第八十九师的“进剿”任务被蒋介石解除,改由敌第十三师专任全区的“追剿”。

4月10日,敌人集中了第十三师、第五十八师、第三十师、第三十五师等部,企图“清剿”光山以南地区。13日,敌十三师为了抢攻,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前急进,和其他敌人的距离越拉越远。红二十五军当即放弃进攻卡房计划,决心集中力量,打击突出之敌第十三师纵队,并调集地方武装牵制其他各路敌人。

14日下午,敌十三师右纵队沿倒水河西岸进至上潘家河及其以北地区,敌七十五团占领鸡公寨,敌七十八团三营占领黄石岩高地,敌七十八团一、二营在白果树店露营,师部及敌七十六团在潘家河露营。根据敌人的配置和地形条件,红二十五军命令:罗山独立第六师在鸡公寨一带牵制与迷惑敌人,并保障红军右翼的安全;红七十三师从正面向黄石岩敌人进攻,歼灭该敌后,以一部控制黄石岩,其他部队配合主力消灭敌后续部队;红七十五师迂回到黄石岩敌人的右翼,切断其退路,然后集中力量歼灭敌后续部队;红七十四师为预备队。命令下达后,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战士们听说要狠狠地打击敌人主力十三师,无不欢欣鼓舞,积极开展“挑应战”活动,纷纷表示要“多捉俘虏、多缴枪”。

当夜,红二十五军秘密进抵黄石岩附近,红军罗山独立第六师也迫近了鸡

公寨。15日拂晓,敌七十八团一营、二营开始渡河,企图会合其第三营后,与河西主力齐头向郭家河进犯。红七十三师乘漫天大雾,以迅速勇猛的动作,首先攻占黄石岩制高点,歼敌七十八团三营一部,随后配合红七十五师将敌七十八团残部全部压在河边狭窄地段上。经反复冲杀,将敌大部歼灭。敌指挥官见此情势,一面急令其左纵队驰援,一面指挥两个营渡河投入战斗。红军主力遂转攻渡河部队,予以迎头痛击,打得这股敌人仓皇回窜。时逢狂风暴雨突然袭来,河水陡涨,渡河敌人被淹死甚多。与此同时,牵制鸡公寨之敌的红军罗山独立第六师,也向该敌发动猛攻。敌人误以为红军主力由上游渡河发动攻击,慌忙退至钟家岗;天黑后,又怕红军夜袭,率残部向南退至十里以外的香炉山。

潘家河战斗消灭了敌主力十三师一个多团,打破了敌人“追剿”光山南区的计划。战斗过程中,敌十三师左纵队得到红军接应获胜的消息,借口天雨路险,无线电件失灵,不敢前来增援,还伙同敌三十五师于出发后退回原防地;敌五十八师则滞留在老君山一带,不敢前进,气得敌指挥官撤销了敌十三师的“追剿”任务,改由敌八十九师接替。

4月18日,红二十五军到达杨泗寨附近时,与大河铺出发的敌三十一师四个团遭遇,随即展开战斗,歼敌一部。20日,敌三十师、三十一师硬着头皮再次向杨泗寨进攻。红二十五军坚守阵地一日,给来犯敌人以沉重打击,歼敌数百名。战后,据敌三十一师战报自供:此战,仅军官就伤亡团长两名、营长6名、连排长30余人。

在主力红军连续取得胜利的同时,各独立师、游击师也积极主动地开展游击活动。有的深入敌占区,截断敌军火、给养;有的对敌人驻地进行骚扰、袭击,迫使敌人不得不缩短防线,加强守备。这些行动,既让部队得到了给养、武器、弹药的补充,又扩大了红军的活动区域。至此,蒋介石苦心经营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大规模划区“清剿”计划被红军彻底粉碎。

(作者单位:安徽金寨干部学院)

# 保卫广州,孙中山从容指挥

贾晓明

1922年6月,因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赴上海。1923年1月,表示服从孙中山的粤、滇、桂等军队组成讨贼军,将陈炯明叛军逐出广州。2月,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重建陆海军大本营,以大元帅名义统率各军,开展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工作。此时,正值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打败了皖系、奉系军阀,控制了北洋政府。直系军阀迷信“武力统一”,企图联合陈炯明、沈鸿英等人,消灭广东的革命势力。陈炯明被逐出广州后,一面向直系军阀求援,一面指使自己的旧部假装投降,静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因此,当孙中山派干部和部队进驻东江地区时,陈炯明叛军将领果然纷纷向孙中山表示“悔过”,并表示愿意接受“改编”。4至5月间,孙中山亲自指挥讨

贼军击溃了受直系军阀支持的沈鸿英叛军对广州的进攻,成功粉碎了直系军阀利用沈鸿英“武力统一”广东的阴谋。在沈鸿英叛变后不久,在直系军阀的指示下,陈炯明以为时机已到,立即命令手下重举叛旗,突袭驻扎东江各地的讨贼军部队。5月中旬开始,孙中山又亲自指挥讨贼军各部征讨再次叛变的陈炯明旧部,与叛军在博罗、惠州等地激战。10月5日,直系军阀头子曹锟通过贿选成为“总统”。10月10日,曹锟“就职”,还颁发了一部所谓“宪法”。曹锟的贿选与“制宪”,严重践踏了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及其规定的国会制度。孙中山以中国国民党名义发表宣言,揭露曹锟贿赂窃位的罪行,又以大元帅府名义下令讨伐直系军阀,并指出:“今日欲解决时局,除非扫除军阀,方为根本解决。”直系军阀为了对抗孙中山和其领导的广州革命政府,向陈炯明叛军输运了大批武器弹药和金钱,还协助陈炯明从香港潜返东江,主持“全面反攻”。

得到直系军阀接济的叛军实力大增,于11月击败讨贼军。讨贼军组织反攻,想挽回颓势,但随着反攻失败,石龙、石滩相继失守,叛军大举逼近广州。孙中山于12日从前线返回广州后,临危不惧,指挥若定。他首先对讨贼军各部进行收容整顿,布置广州防务:派部队坚守白云山、龙眼洞、瘦狗岭、观音山等险要地区,并电令驻防增城守军坚守增城;同时调集湘军谭延闿及驻粤北的豫军樊钟秀部等军星夜兼程赶到广州,参加作战;又偕同苏联顾问赴虎门要塞巡视,动员海防舰队备战。经苏联顾问的建议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动,广州工农群众纷纷组织起来,“报名加入广州的守卫队和协助军队”保卫广州。17日,陈炯明叛军洪兆麟、杨坤如部直抵广州近郊石牌、瘦狗岭、黄埔一带,距离广州市区仅约二十里。另一支叛军林虎部被增城守军阻击,不能渡过增江。洪兆麟认为广州唾手可得,于是不等林虎部到来,就于18日沿广九铁路向广州守军进攻。危急关头,孙中

# 邵伯之战,我华野部队创造防御战经典范例

高凯

1946年6月,国民党军调集重兵,对我苏中根据地大举进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华中野战军运用集中兵力,采取各个击破、速战速决、以运动战为主的战术,狠狠打击来犯之敌,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取得了多次胜利。邵伯位于扬州以北,形势险要,四面河流交叉,南北仅有运河堤一条陆道。为了保卫邵伯,早在开战之初,我华野首长就曾亲临邵伯视察,指导备战工作。根据邵伯狭窄险要、河湖纵横的地形特点,提出“集中主要兵力扼守要点,各团轮番守备阵地”的作战方针,并对邵伯的阵地编成、工事构筑、兵力部署和火力配备作了详细指示。

1946年8月下旬,我华野部队发起如黄公路战斗时,邵伯保卫战也随之打响。当时,国民党军整编二十五师集仙仙女庙、宜陵一线,企图沿运河线北犯,攻取邵伯、高邮、宝应,配合敌整编七十四师、第七军等会攻两淮(淮阴、淮安),并策应东线如皋等地的“清剿”。我华野首长决定以第十纵队和华中军区第二军分区的第四、第五两个团保卫邵伯。具体部署是:以四团守邵伯,五团守乔墅,十纵主力控制于乔墅以北,派一部守丁沟,以配合野战军主力包围、消灭敌人。

8月23日,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五师第四十旅、第一〇八旅,兵分三路进攻我华野部队的邵伯、乔墅、丁沟。国民党军在飞机、炮艇配合下,连续发起猛

攻。国民党军十分骄狂,扬言“邵伯指日可下”。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五师师长黄百韬更是夸口说:“少则几小时,多则几天”。在水上、空中火力支援下,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两个旅,不断发动进攻。我华中野战军和华中军区第二军分区部队依托阵地,英勇抗击敌人,击沉多艘炮艇。邵伯群众也主动组成担架队、运输队,支援前线,振奋了我军将士的士气。战斗进行到夜晚,各地进攻之敌均被我军击退。

24日,乔墅河南地区被国民党军暂时攻陷,我军退守河北地区,继续阻击敌人。25日,经过反复白刃肉搏和连续反冲击,我华中军区守卫部队多次打退国民党军进攻,国民党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只攻克了一处距离邵伯尚有3公里的阵地,敌指挥官刚在阵地上向黄百韬表功,就遭到我增援部队八十二团的打击,狼狈退出该阵地。

26日,国民党军再次集结兵力猛攻邵伯。激战3小时,我华野部队邵伯阵地仍岿然不动,国民党军却死伤仍达2000余人。当天黄昏,敌师长黄百韬得悉国民党第九十九旅在泰兴县分界被歼,感到侧后受到严重威胁,再打下去凶多吉少,于是命令所部撤退。至此,邵伯保卫战结束。此战,我华野部队不但坚守住了邵伯阵地,更予敌人以重大杀伤,创造了华中战场解放战争初期阵地防御战的经典范例。战后,我华野第二军分区表彰部队特等战斗英雄2人,战斗英雄21人,战斗模范112人。

# 柏家圩伏击战,新四军“随机应变”夺胜利

徐轶

1941年底,新四军二师六旅奉命率领十六、十七团到淮南津浦路东休整、作战,留下十八团归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建制。十八团转战安徽定远、凤阳、怀远等地的抗日前线,以机动灵活的战术积极开展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斗争,给予日伪沉重打击。

1942年3月1日,十八团得到确切情报,驻永康镇的日军派出一部到水家湖据点领取军需物资,计划第二天从原路返回。十八团指挥员认为这是个开仗的好机会,于是决定把柏家圩作为埋伏点,打一个伏击战,消灭这股敌人。2日拂晓,十八团政委廖成美、副团长彭济伍率领4个连秘密到上户陈村、柏家圩一带,设下了伏击圈。

上午9时许,据侦察员报告,敌人运输队由日军一个中队和伪军一个中队组成,沿公路行进;与此同时,永康镇的敌人也已出动,赶来接应运输队。

十八团指挥员立即命令战士们准备战斗。当敌人运输队走到距伏击圈四百米处时,突然停止了前进,派出几个侦察员进入上户陈村探路。由于十八团战士听得懂日语,敌人找了半天,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便向运输队发出了“安全”信号,但敌人运输队仍然停留在原地。十八团领导研究后认为:敌人运输队没有发现有埋伏,却按兵不动,显然是想等待永康镇的日军赶来会合,但永康镇的日军只有一个中队,即使倾巢而出赶来,消灭敌人的运输队也是有把握的。于是,十八团指挥员果断决定兵分两路:一路负责阻击永康镇来援之敌,一路负责歼灭敌人运输队。

下午2时许,敌人运输队终于看到了永康镇的日军发出了信号弹,于是急忙出发。但狡猾的敌人突然改变了路线,他们放弃公路,改为沿一条小路行进。针对敌情的变化,十八团指挥员果断对部队进行了调整。十八团的一个连从正面突然出击,把走在队伍前面的敌人全部消灭;正当敌人混乱之际,十八团的另一个连绕到敌人背后,向押运的伪军发起猛攻,很快歼灭了大部分敌人,并掩护运送物资的民夫迅速撤离战场。日军头目见状,只得带着残敌退到一个干枯的小池塘里负隅顽抗,被十八团战士团团围起来。不久,副团长彭济伍率两个连的预备队赶到战场,指挥部队向敌人发起最后的猛攻,很快消灭了残敌,并活捉了日军头目及翻译官。

永康镇的敌人听到枪声,加速向战场赶来,途中遭到十八团打援指战员的顽强阻击,在得知运输队已经全军覆灭后,只得拖着尸体和伤员,狼狈撤回永康镇。此战,十八团全歼日军一个小队,伪军一个中队,俘虏日伪军30多人,缴获了掷弹筒1门,机关枪1挺,步枪30多支以及敌人运送的军需物资。此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津浦路西抗日军民的斗志,新四军第二师政治部办的《建军》杂志1942年第六期,详细报道了此次伏击战情况。

# 八路军南下支队策动左钦彝部起义

吕彬彬

1944年11月,以八路军第三五九旅为主力组建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以下简称南下支队),在司令员王震、政委王首道率领下,从延安出发,一路南下,进入湖南后,经报中共中央批准,支队取消了原番号,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为了深入湘中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南下支队决定派队伍进驻湘阴敌后地区。1945年4月2日,熟悉湘阴情况的杨宗胜、吴光远率领南下支队第六支队100余人,穿过敌人防守空隙,到达湘阴,很快建立了中共湘阴县委和湘阴县抗日民主政府。湘阴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第六支队领导经过分析,决定运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瓦解敌人的营垒,扩大抗日力量。经过六支队和地下党、进步人士的多次思想工作,身为湘阴县日伪县长兼保安司令的左钦彝,认识到只有弃暗投明,才是唯一的出路。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杨宗胜,表示愿意率部起义,接受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左钦彝率部起义后,该部被改编为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一师,左钦彝任师长。为有利抗日斗争,杨宗胜派了一批干部到左部协助工作,并要求左部表面上仍然打着日伪旗

号,暗中配合六支队打击日伪军。左钦彝起义后,将保安队符号、袖章、口令送给第六支队的侦察员,使他们在南至长沙,北通岳阳的敌占区通行无阻。他积极配合六支队打击敌人,经常派人密送情报。当日军出动“讨伐”六支队时,他及时通风报信,甚至让六支队指战员隐蔽在他的据点里。在左钦彝配合下,第六支队留在湘阴地区艰苦战斗了5个多月,成功开辟了湘阴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日伪军进行了数十次战斗,屡战屡胜,成为威震湘东的一支抗日劲旅,队伍也日益壮大。日军屡次遭到六支队的打击后,对“毫发无伤”的左部产生了怀疑,便派杨姓特务到左部当翻译,行监视之实。左钦彝识破后,处处提防。一天,杨姓特务侮辱妇女,被左钦彝捉住,当着敌人的面将其枪决;接着,又接连铲除了几名湘阴县的多名与日军“密切合作”的汉奸、土匪头子、恶霸。第六支队还通过左钦彝的介绍,派副政委罗振坤带领几名地下党员,打入驻长沙日伪“和平军”毕坊清部,成功策反了该部5个团5000余人起义。起义后,毕坊清部被改编为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二师。不久,抗日战争胜利,左钦彝奉命率部随第六支队北返,并在与六支队的联欢会上正式宣布武装起义。